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談老上海的懷舊論述

Self-Fashioning of a Global City: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 Nostalgia

doi:10.6752/JCS.200509\_(1).0003

文化研究, (1), 200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2005

作者/Author：黃宗儀(Tsung-Yi Michelle Huang)

頁數/Page：73-9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5/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509\\_\(1\).0003](http://dx.doi.org/10.6752/JCS.200509_(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 談老上海的懷舊論述\*

黃宗儀\*\*

73

## Self-Fashioning of a Global City: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 Nostalgia

Tsung-yi Michelle Huang

投稿日期：2004年2月15日。接受刊登日期：2004年8月17日。

\* 本文會議初稿發表於2003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作者感謝汪宏倫博士、朱元鴻教授、《文化研究》匿名審查人、編輯委員以及李紀舍助理教授對本文提出寶貴的修改建議與不同觀點。文中上海弄堂照片由郭奇正副教授提供，特此致謝。編輯陳惠敏、劉允華幫忙校稿排版，亦在此一併致謝。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2-2411-H-003-021-BI）部分研究成果。

\*\* 黃宗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助理教授  
通訊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子信箱：tyhuang@seed.net.tw

**摘要：**

本文試圖以上海作家王安憶的作品為例，對照參考都市計畫語言，說明上海懷舊語言是全球城市意識型態的特殊表現。分析東亞全球城市建造(global city formation)的都市規劃語言，我們常發現兩個重要元素，其一是向外尋求可供參照之先例，其二是向內尋找歷史偶發事件來證明城市本身具備全球化的條件。換言之，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image-making)可說是仰賴如此的雙重鏡相：鏡子的一面映照世界知名的全球城市。鏡子的另一面則映照城市過往歷史，強調全球化的現在與未來能連結往日黃金歲月，因此有其必然性。1980年代後期以來極力發展為全球城市的上海提供了一個具體複雜的例子讓我們思考全球城市形象塑造的意識型態。上海懷舊因全球化而起，試圖將歷史發展的動線與想像中全球城市的原型編織成似乎天衣無縫的全球城市大話(grand narrative)。王安憶的文學書寫也為此大話所驅動，但是文學的思考使她的作品凸顯全球城市願景—上海懷舊—的破綻，亦即歷史發展既然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日常生活依賴的地理空間如果消失，歷史也可能隨之飄零潰散。或許新與舊在上海不能並存，召喚原汁原味的老上海並不足以充分消弭全球城市特殊地景與文化帶來的各種衝突。上海的過去與未來像是兩面鏡相，相互映照，卻無法彼此連結，構成一體，而懷舊論述所呈現的歷史深度感常只是全球城市為求落實資本主義規劃空間所創造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關鍵詞：**全球城市、空間生產、上海、懷舊論述、王安憶

因此在二十世紀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進的都市同步了。

——李歐梵

王琦瑤的傳說是上海繁華夢的景象，雖然繁華是舊繁華，夢是舊夢，可那餘光照耀，也足夠半個世紀用的。

——王安憶

## 一、雙重鏡相與上海的全球化

文革風雲之後，在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推動下，門戶開放政策於1978年施行，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加速，上海漸漸成爲中國經貿發展重點，原本匯集在南方的資本湧入滬上。尤其近年來更積極轉型爲全球城市(global city)，在世人注目之下「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搖身成爲引領中國邁入全球化的樞紐城市。<sup>1</sup>本文透過上海近年的發展，探討東亞全球城市建構與日常生活及懷舊論述的關連。以王安憶作品爲舉證之文化文本，同時參考都市計畫語言來分析全球城市自我形象塑造的邏輯與問題。換言之，方法論上是引用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空間理論中對感知空間(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與規劃空間(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的區分來對照文化文本與社會科學。此一研究的意義與貢獻在於以跨領域的方式探討全球城市的文化想像與意識型態的生產。自1980年代以來地理學學者對全球城市的研究方興未艾，但整體而

<sup>1</sup> 自從1990年浦東新區開發開放計劃在黃浦江東岸推展以來，整個上海的都市重建進入新紀元。全上海經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建設，各項都市工程啓動，各式住辦大樓如雨後春筍出現，上海的都市地理與人文景觀因全球化而急遽改變。如Pamela Yatsko所言，全球化都市改造已將上海變成一個大工地：「整個城裡到處可見一片一片樓房被夷平，把這個『東方巴黎』的許多區域變成巨大的建築工地——起重機、電站、推土機忙著打摩天樓的地基、建高架高速公路、挖地鐵隧道。建築師忙著設計有玻璃表面的辦公大樓和一排排豪華公寓……」(Yatsko, 1996: 69)。都市計劃局的官員則是這麼描述上海的發展前景：「我們要建六十四公里長的鐵路和輕軌，六百五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一千兩百萬平方米的辦公室與住宅，還得拆除二十六萬五千戶舊房子，翻新兩千萬平方米的現存房舍」(Maass, 2000: 23)。關於上海全球化的討論甚多，可參見：Kris Ol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Urban Spaces: Pacific Rim Magaproject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Globalizing Shanghai: the 'Global Intelligence Corps' and the building of Pudong." Fulong Wu, "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 以及Y.M. Yeung and Y.W. Sung編著之*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言，地理學對全球都市的討論並未深入思考文化的影響與地位。地理尺度並不同於組織生活的空間感，我們除了需要瞭解全球城市的功能與特性之外，還要深究全球城市造成的地理重整如何改變眾人日常生活的運作？又是什麼樣的邏輯讓規劃空間與感知空間似乎可以天衣無縫完美接合？本文試圖取徑文化研究來回答這些問題：檢視「小說」的城市書寫（代表感知空間）與政治經濟學的「大話」（代表規劃空間）各自如何驅動懷舊想像來型塑全球城市的身分，進而彰顯建構全球城市之意識型態運作於日常生活空間所造成的種種矛盾與張力(tension)。

分析東亞全球城市建造(global city formation)的都市規劃語言，我們常發現兩個重要元素，其一是向外尋求可供參照之先例，其二是向內尋找歷史偶發事件來證明城市本身具備全球化的條件。換言之，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image-making)可說是仰賴如此的雙重鏡相：鏡子的一面映照世界知名的全球城市，如倫敦、紐約、香港或新加坡，這些典範成爲建構全球城市的藍圖。鏡子的另一面則映照城市過往歷史，強調全球化的現在與未來並非與過去斷裂的巨大改變，而是在發展上有跡可尋，能與往日黃金歲月連結，因此有其必然性。舉例而言，日本學者町村敬志(Takashi Machimura)對東京全球化的研究便印證這個雙重鏡相的運作。他指出在1980年代爲推動東京的全球化，市政白皮書致力塑造全球城市形象，當時的主要訴求之一是強調新東京與江戶(Edo)時代的歷史關連，另一個策略即是把東京與其他全球城市諸如紐約、巴黎或倫敦相互比較、截長補短(Machimura, 1992: 125)。

1980年代末期以來極力發展爲全球城市的上海提供了一個具體複雜的例子讓我們思考全球城市形象塑造的意識型態。上海近年在大規模工程飛快進行的同時，不少政治及都市論述不約而同地運用雙重鏡相的策略來實踐「發展的硬道理」。<sup>2</sup>首先，爲了成爲全球資本匯流中心，上海是以原型的全球城市(generic global city)爲範本而建造的。<sup>3</sup>官方的全球化發展語言紛紛強調以「世界明星城市」爲上海二十一世紀發展楷模。<sup>4</sup>例如，《浦東新區手冊》提到把浦東曼哈頓化是該區發展要點：「它〔陸家嘴〕將不僅成爲浦東的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也是全上海的新商業中心。

<sup>2</sup> 「發展是硬道理」爲上海街頭標語。

<sup>3</sup> 李歐梵將“generic city”譯爲「通屬城市」(2002:25)。關於上海如何以原型全球城市爲藍圖打造都市景觀，參見拙作〈都市空間的生產：全球化的上海〉。

<sup>4</sup> 在此借用孫海鳴與劉適全的用語。爲了提供浦東發展明確方針，孫與劉製作了〈世界明星城市比較表〉，這些明星城市包括紐約、東京、香港、新加坡和浦東（孫海鳴、劉適全，2000：118-20）。

陸家嘴就是要改建成上海的曼哈頓」(Yeh, 1996: 279)。費孝通也說上海的浦東應該發展成未來的內陸的香港，一個金融、外貿、訊息、交通、以及科技的中心(Fei, 1990: 27)。這些論述以全球城市功能為著眼點，戮力將上海在最短的時間內打造成東亞重要的全球金融貿易中心。

另一方面，規劃空間的各路旗手像是大力促成上海全球化發展的都市計畫官員、跨國公司、地產業者等等也經常回顧上海歷史，藉此證明上海發展成二十一世紀全球城市的先天優越性。似乎今日的浦東奇蹟就是過去「東方巴黎」的再現，此城市歷史論調可說是雙重鏡相的另一面。舉例而言，鄧小平即言，「上海在幾十年前是各國貨幣流通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今日應極力讓她重獲過往輝煌，中國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上海就得起帶頭的作用」。<sup>5</sup>費孝通則說上海絕對有資格成為中國（內地）的香港，一個不言自明的原因是其歷史優越性：「早在30年代上海就有168家銀行，其中包括58家外國銀行，上海的金融街是當時亞洲的金融中心」(Ibid: 26)。外商也持同樣的論調，在1990年召開的第一屆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 Advisory Council for Shanghai)中，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的主席格林柏格(Maurice R. Greenberg)便說，「在此世紀更迭之際，上海有個宏偉的願景，即是要將上海重建(reestablish)為亞洲金融與工業中心」。<sup>6</sup>上海一位地產經紀公司的負責人(Liu Xinjian)於1995年受訪時談到上海的發展，也非常樂觀地說，上海過去的殖民歷史正是今日她能贏在起跑點的關鍵：「我們率先引進國際化與法規……〔上海〕是中國第一個吸引全國和全世界人聚集於此的世界城市」。<sup>7</sup>

仔細分析這兩種訴求，我們不難瞭解驅動上海全球城市建構的意識型態與東京類似，皆兼具回顧歷史與尋求典範兩個重要元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雙重鏡相在上海所見之特殊性。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曾提出深刻的觀察，他認為如果全球化香港的問題在於生產了一個消逝的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那麼上海的全球化面臨的問題則是重現(reappearance)，一種積極快轉（而非倒帶）到過去（“Fast Forward to

<sup>5</sup> Chen Qingbai and Shi Wei, “Reestablishing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Beijing Review* 15-21 August 1994:14-7.

<sup>6</sup> Dai Gang, “Large-Scale Development Planned for Shanghai.” *Beijing Review* 23-29 April 1990: 41.

<sup>7</sup> Lincoln Kaye, “Shanghai Resurgent: City’s champions see it as region’s natural lead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1 May 1995: 20-1.

the Past” )的集體慾望(Abbas, 2000: 779, 780)。相對於東京的江戶時代(1603- 1867)，全球化上海集體慾望的投射對象主要是所謂的「老上海」，亦即1930年代租界時期的上海。<sup>8</sup>我認為這股自1980年代迄今歷久不衰的上海懷舊風潮，其實不能僅就歷史記憶或文化產業的框架來分析，而必須思考上海全球化過程所需營造之空間意象。<sup>9</sup>老上海之所以成為懷舊論述一再召喚的歷史斷片，實是因其乃是推動全球城市空間塑造的雙重鏡相交會之處：老上海既是過去，也是全球城市的未來。

換言之，老上海這個獨特的時空既是可供回望的城市歷史，又具備如今發展大計的全球城市雛形。老上海所代表的（半）殖民租界歷史，亦即阿巴斯所言之「治外法權世界主義」的特色(cosmopolitanism of extraterritoriality)(Ibid: 774)，使得全球化時代向外尋找發展模範時所見之他者（如倫敦或紐約）很容易被融入過去自我（十里洋場）的一部分，如今只需重拾舊夢，恢復昔日榮華。這便是為何官商說法常引用上海歷史，強調老上海比今日世界許多城市更早全球化，在二十世紀初期便已發展成有世界主義特色的國際大都會，藉此「事實」證明今日的全球化發展實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sup>10</sup>這些論調假設雙重鏡相能完美接合，老上海的租界世界主義歷史弔詭地證明了上海是今日得天獨厚的全球城市(Shanghai was born as a global city)，而都市規劃者的工作便是在硬體發展上參考其他明星城市，讓上海在二十一世紀成為真正的全球城市。(Shanghai becomes a global c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sup>11</sup>

不能忽視的是，透過懷舊論述，城市宏觀規劃與日常體驗得以緊密結合於全球

<sup>8</sup> 關於上海租界史，簡述如下：「1845年，英國首先在上海設立了租界。之後，美國在上海設立租界。1849年，法國也在上海設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後，上海實際上被劃分為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部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租界收回。」(http://www.ctn.com.cn/china/shanghai/youyou-02.htm)

<sup>9</sup> 一般對上海懷舊批評的主要論點為懷舊意識常為全球資本所用，使老上海成為象徵文化資本(symbolic and cultural capital)。例如，阿巴斯認為，上海的古蹟保存即是文化遺產資本化的徵狀之一，1930年代老上海世界都市風情的再現成為上海今日順利走向全球化財經中心樞紐都市的關鍵(Abbas, 2000: 781)。就消費空間而言，從各式復古的上海酒吧、和平飯店的老爵士演奏、以百樂門為號召的舞廳與娛樂城，到以石庫門為標誌的上海新天地休閒廣場，懷舊似乎只是當代流行消費的代名詞。可參見李陀主編之《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像》。

<sup>10</sup> 1990年代上海的都市重建工程常被推動者媲美為「灰姑娘」計畫，指其規模可將浦東點石成金，一夕成名；我認為老上海的懷舊論述則借用了「睡美人」童話的意識型態，強調上海早就是世界都市，如今的全球化發展只是在十里洋場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sup>11</sup> 如孫海鳴與劉迺全所言，「為使浦東新區盡快地向世界明星城市靠攏，發揮其龍頭作用……我們試圖在總結世界明星城市基本特徵及標誌的基礎上，建立一整套的世界明星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以供浦東新區及其他城市，與世界明星城市比較」(2000: 136)。



化發展的脈動中。也就是說，老上海懷舊論述在上海城市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產生一套空間語碼讓城市使用者透過雙重鏡相得以理解，認同當下的都市重建並樂觀看待全球城市的未來。似乎城市居民只要能在通往未來的路上嗅到些過往的氣息，那麼眼前各處進行的重建工程便顯得理所當然。<sup>12</sup>彷彿只要老上海能在千呼萬喚下重現丰姿，進行中的全球化大計便具有歷史延續性，不再只是幻境，而是能夠兌現的美好生活以及人人具體可觸的事實。這類大話(grand narrative)將租界歷史簡化為過去的榮耀(old glories)，鼓勵城市居民藉懷舊串連起斷裂的時間，佐以「與世界接軌」的空間想像，兩者完美地投射在老上海的意象上。<sup>13</sup>因此，召喚老上海成了讓大家接受眼前都市發展的重要策略。雖然今時今日諸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空間因全球化而不斷地受到排擠與壓縮，但都市規劃與發展論述一再強調全球城市雨露均霑，榮景可期。<sup>14</sup>老上海懷舊論述因此不僅是時間上與過去相連，更是一種空間書寫(place-making narrative)，藉由重現某一段特定歷史的都會空間來讓居民認同現在的各種改建，進而期待未來的全球化上海。<sup>15</sup>

訴諸懷舊情感的敘述不僅是推動全球化的種種官商說法，與今日日常生活貼近的电影與文學創作更熱中此道。<sup>16</sup>我們要問的是，相較於上海都市發展論述中所見之懷舊意圖，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s)中老上海的重現與全球城市意識型態的關係為何？是否也將老上海投射為回顧歷史與尋求典範雙重鏡相的共同焦點？以下將以王安憶短篇小說集《妹頭》中收入的散文〈尋找上海〉與長篇小說《長恨歌》為例，探討王安憶的懷舊上海書寫與建構全球城市之雙重鏡相如何糾結拉扯，試論全球化年代文學生產與雙重鏡相之間各種複雜的緊張關係，並進一步批判全球化空間塑造意識型態隱藏的問題。這也就是筆者的批評位置：批判全球城市建造的內在意識以及現代化的進步修辭(rhetoric of progress)。<sup>17</sup>

<sup>12</sup> 例如，浦東陸家嘴商業新區與外灘隔江相望，有如彼此的鏡相。此觀點可參見薛立勝「上海外灘的新魅力」(<http://www.zhcchina.com/html/Cat3/1625-1.html>)。

<sup>13</sup> 「與世界接軌」為上海城市發展口號。

<sup>14</sup> 關於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空間如何因全球化被排擠與壓縮，參見拙作：〈都市空間的生產：全球化的上海〉。

<sup>15</sup> 如是觀之，懷舊論述也是文化資本的創造。作者感謝審查人的意見。

<sup>16</sup> 除了王安憶的作品，陳丹燕一系列的《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亦是暢銷作品。電影方面像在香港1980年代後幾部懷舊電影如《胭脂扣》、《上海之夜》或改編自張愛玲原作的《紅玫瑰白玫瑰》、《傾城之戀》與近期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都可見老上海的流光餘韻。

<sup>17</sup> 感謝審查人的提問。



## 二、〈尋找上海〉：全球化都會華麗區vs. 正在消逝的上海弄堂

首先，我們可藉王安憶作品中對上海當代市景的觀感來檢視全球城市自我形象塑造所產生的集體矛盾心態。王安憶有海派傳人之稱，近年來她的作品備受矚目，<sup>18</sup>從《長恨歌》、《妹頭》、《富萍》到《上種紅菱下種藕》，題材主題或有不同，但敘述策略皆以舊日上海日常生活細節為核心。細讀她的上海「家城」(“home city”)書寫，在在傳達一個重要信念：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瑣細事物是成就上海璀璨風華的要素。<sup>19</sup>她的懷舊敘述一再呈現了與全球城市雙重鏡相或附和或抗拒的張力。王安憶對照新舊上海，感懷弄堂空間與生活細節消失，處處所見反而是薩斯琪亞薩森(Saskia Sassen)所謂「都會華麗區」(urban glamour zone)(1998: xxxiii)的景觀：城市空間綴滿高度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高級住宅、頂級旅館與時髦餐廳。作者於作品中一再強調昔日上海里弄生活細節才是老上海光華精髓所在，因為這些不朽的細枝末節穿越時空，無可取代。同時，王安憶鏗而不捨地在上海轉型為全球城市之際透過書寫里



全球城市都會華麗區：  
上海新天地將石庫門里弄改造為時尚消費空間  
(攝影：郭奇正)

<sup>18</sup> 1980年代後期以來學界對王安憶的討論十分熱烈。舉例而言，唐小兵、張旭東、王斑皆曾為文討論王安憶的《長恨歌》。唐小兵借用克莉絲蒂娃的理論，認為王安憶小說中的哀傷體現了他所謂後現代憂鬱(“a postmodern melancholy”)(1997: 198)。張旭東引用班雅明閱讀波特萊爾的方式解讀王安憶作品，認為《長恨歌》中展現的懷舊是作者個人面對中國現代性，在二十世紀末上海的震驚自保(shock defense)，以個人回憶與弄堂生活這類小敘述抗衡大歷史(official history)。王斑的論述則強調以商品文化來理解《長恨歌》中的懷舊與歷史觀。諸位學者的洞見對理解王安憶作品與其時代性甚有助益，但他們對於王安憶作品中的上海與全球城市的空間生產之間盤根錯節的關連並未多加著墨。我認為深入瞭解王安憶1990年代的文学作品生產(如張旭東文章標題所示)的關鍵在於上海全球城市空間生產的特殊地景與意識型態。

<sup>19</sup> 「家城」一詞借用李歐梵語(2000: 303)。

弄日常生活細節來填補新上海的欠缺。她的作品說明了當代全球城市的敘述以懷舊形式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試圖透過懷舊來處理全球城市的特殊地景與文化。作者回望歷史鏡相，訴諸日常生活細節來強調今昔之別，並藉此賦予無根的全球化鏡相一個可知可感的根源。

〈尋找上海〉的標題耐人尋味。王安憶既已身在上海，又何需尋找眼前的上海？這篇可視為作者上海故事總綱的散文說的是亟欲尋回即將永遠消逝的「家城」的渴望。老上海在文中的功用呼應雙重鏡相之一，亦即追溯回望歷史以面對全球化的現在與未來。然而，與上述都市規劃懷舊論述不同的是，王安憶並未在老上海這面鏡子看見全球城市原型。<sup>20</sup>相反地，全球城市與老上海似乎是對立的兩面。就敘事技巧而言，作者試圖以老上海影像來填補全球化生產看似無所不在的標誌性空間(monumental space)。<sup>21</sup>王安憶提到：

……總之，上海變得不那麼肉感了，新型建築材料為它築起了一個殼，隔離了感官。這層殼呢？又不那麼貼，老覺得有些虛空。可能也是離得太近的緣故，又是處於激變中，映像就都模糊了，只在視野裡留下一些恍惚的光影。(2001: 221)

就某種程度而言，她穿街過巷、綿密細膩的筆觸想要填補的正是外地人難以察覺的新上海的欠缺。<sup>22</sup>上海要將新衣穿得貼身就得將光鮮表象和實質核心之間的空隙填滿。在這篇散文中王安憶以「步行」這個日常生活實踐填補新上海欠缺的細節。每日步行的習慣讓王安憶探索這個都市的空間，實實在在地讓她追憶消逝了的老上海感官細節與上海舊街提供的各式各樣人文景觀。撫今追昔，上海新闢的街道令人感嘆，「那時候，這條街上的臉相是很豐富的，不像現在這樣整齊劃一。並且每一種臉相就附帶著一種特別的行止，這就加強著它的與眾不同」(Ibid: 211)。

在此，多樣特別的臉相寓意舊上海。王安憶以蒙太奇的方式描述今日新上海街道上時髦卻相仿的面孔讓她看到記憶中的臉相。小煙紙店女店主的面相便是令她難以忘

<sup>20</sup> 老上海的時間背景主要為1930年代，但在諸多論述中已泛指文革之前的上海。

<sup>21</sup> 根據列斐伏爾的說法，標誌性空間代表權力意志，這樣的空間形式：「總是體現與灌輸一個淺顯易懂的訊息。它說出了想說的一切，然而也隱藏了更多：就其性質而言，標誌性建築是政治的、軍事的、極端的法西斯主義，它們標示出表面跡象之下的、宣稱自己表達了集體意志和集體思想的權力意志與權力獨斷」(1974: 143)。

<sup>22</sup> 王安憶對上海生活的書寫方式或令人聯想周蕾對張愛玲作品的討論，亦即女性作家、現代性與細節的論述。

懷的例子：所有小藥房老闆都長著橢圓的臉型，帶著些凶相，眼球突出，嘴唇肥厚。王安憶以面相學(physiognomy)細節來描述婦人的面容以及從事的職業，進而呈現她所代表的空間。在人群中揀選這樣一個面相可以激發想像，思索消逝的舊有生活方式和都市空間：

這類小煙紙店，是將自家的街面房子〔對著淮海路〕破出牆來開的張。這條街奇怪就奇怪在這裡，豪華的商店間著民居，在商家背後，就連著深長的入口龐雜的弄堂。(Ibid: 206)



消失中的日常生活空間：  
上海新天地附近里弄，居民已動遷他處，里弄將完全清除  
(攝影：郭奇正)

除了小煙紙店的女店主，老男人哀傷的臉相又是上海懷舊地圖的另一項景致。那是一張在燈紅酒綠城市裡略帶憂愁的面容，靠著冬天替人們提熱水為生（當地的熱水站叫「老虎灶」），那是特別仰賴弄口巷尾空間的生意。以往人們的營生是如此依賴弄堂，以至於面相和面相所代表的地方生活片斷隨著弄堂拆遷而消失無蹤，只能在追憶的鏡子裡重現。<sup>23</sup>〈尋找上海〉字裡行間顯露的往日風華難在的失落不安與全球化大話所宣揚的新上海夢形成對比，讓人得以重思都市計畫語言中雙重鏡相型塑的理想全球城市。對王安憶而言，上海的全球化規劃空間是群起的高樓和混凝土構成的空容器，欠缺的是尋常生活點滴。於是有如神話中的女媧補天，她試圖召喚里弄日常生活細節來填補生活空間(lived space)和規劃空間(conceived space)兩者的縫隙。<sup>24</sup>

<sup>23</sup>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仿30年代的街道讓已經消失的「老虎灶」重現。

<sup>24</sup> 王安憶有如女媧補天而非質疑「天」（全球化的新上海）可能是諸多權力運作的建構。換句話說，她懷舊書寫抒發的新不如舊、新上海浮華無根的感嘆，或可說明全球城市空間（如浦東陸家嘴）與在上海人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但就某種程度而言她的作品並未質疑規劃空間生產過程的權力運作與意識型態。文中美學化、標誌化的日常生活細節似乎也難以讓人瞭解為何大批高樓大廈會迅速取代傳統弄堂建築，或者為何動遷、下崗都在上海與國際接軌之際成了硬道理。感謝審查人的提問。

然而，深究王安憶的懷舊，她並非一廂情願地只想拋開現在，回到過去。在〈尋找上海〉的結尾，香港的現在成了想像中上海的未來。之前她哀嘆新都市大計埋沒老舖子和形形色色的熟悉面孔，文末卻在香港壯麗的夜景找到了上海：<sup>25</sup>靈光乍現的場景是1997年九龍的麗晶酒店，王安憶望著九龍對岸香港島的燈火在海天間綻放絢爛的光芒。窗外的夜景令她想起之前看到的上海地質形成概述，於是忍不住驚嘆：「香港島的燈光明亮地鑲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間。這真是海上奇觀，蠻荒之中的似錦繁華，是文明的傳奇。於是，陡然間想起了上海……這畫面何等壯麗！上海原來是這樣冉冉升出海面，雲霧散盡，視線走近，走近，走了進去，被瑣細的筆觸掩埋，視線終於模糊了」（Ibid: 222）。前文中點滴訴說的是對上海種種新造建築的陌生不安與對高樓簇起之前里弄生活的念念不忘，但到了香港，當地的新式建築交織的繁華夜景又成為上海的過去與未來。這暗示王安憶的基本態度並非反對上海全球化的發展。換句話說，王安憶一方面不斷回到老上海尋根，透過作品昭示新上海不該只是空洞的拜金之地，真正的上海並不是浦東的標誌建築或者時髦的新天地休閒廣場；然而弔詭的是，在九龍的麗晶酒店她無法再與摩天樓夜景這樣的資本主義展示櫥窗保持批判距離，因而將香港抽象化約為上海發展的傳奇景象。

王安憶透過香港景色所流露對上海未來發展的矛盾情結的確值得深究。當老上海已不可尋，新上海又似乎只是「新型建築材料築起的一個殼」，此時身為東亞重要全球城市的香港於是便成為上海全球化的參考範例。由此觀之，〈尋找上海〉中的香港印證了之前所說全球城市自我形象塑造向外尋求典範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此處的凝視再次顯示老上海在全球城市自我形象塑造過程的重要性。挪用香港與上海「血脈相連」的雙城記論述語言(tale of two cities)，王安憶輕易將眼前的香港置換成上海的過去（與未來）。<sup>26</sup>也就是說，作者其實是藉由香港的全球城市景觀來凝視老上海：透過香港華麗都會所見的上海的原初（「上海原來是這樣冉冉升出海面」），正是懷舊論

<sup>25</sup> 有趣的是，在他城看見故鄉原本便是懷舊的病徵。「懷舊」一詞源自十七世紀末奧地利醫生的醫學診斷，把出征異地的士兵因思鄉情切而在異鄉看到家鄉城鎮的病徵稱之為懷舊(nostalgia)（廖炳惠，2003：179）。

<sup>26</sup> 讚賞香港這面映照上海未來的鏡相的同時，王安憶並未意識到她現在面對上海發展時遭遇的問題，亦即全球化的華麗空間並非小市民的具體生活空間。如果之前她認為全球資本打造的新上海並非講究實用智慧的弄堂上海，那麼她在麗晶酒店所見之全球城市景象（「蠻荒中的似錦繁華」、「文明的傳奇」）又何以代表香港或者涵蓋香港的常民生活空間？端坐豪華酒店中，王安憶遊客的凝視(tourist gaze)所見的是「東方明珠」的華麗，如此的刻板印象使她忽略香港在全球化影響下也可能和她的上海一樣出現地方與全球的衝突與妥協。而此時此地，小說家原先想描述全球化對於當下上海也可能造成的衝擊的慾望也彷彿消逝無蹤。一旦從上海的生活點滴抽離，王安憶似乎立即落入她要抵抗的陷阱。

述中全球化新上海的根源。<sup>27</sup>

整體而言，〈尋找上海〉對香港的凝視，明白凸顯王安憶的老上海與官方計畫雙重鏡相懷舊論述的拉鋸。香港島的明亮燈光與「似錦繁華」是全球城市的具體縮影，或可說是王安憶在上海全球化過程對原型全球城市想像的投射。〈尋找上海〉與懷舊論述官商版本弔詭地存在既不同、又相通的關係。從某個角度來看，王安憶的懷舊是以回顧歷史為中心策略，同時希望加深上海歷史與其他全球城市（如香港）的關連，由此觀之，她的懷舊比懷舊論述官商說法更具雙重鏡相的特性。

### 三、日常生活與上海風華：《長恨歌》

與〈尋找上海〉中展現的企圖相似，王安憶在其代表作品《長恨歌》以縝密細緻筆法召喚老上海鏡相。表面上看來，這個回顧歷史來書寫上海的手法與全球城市自我形象塑造懷舊原則若合符節，都是為了給新上海一個有憑有據的根源。然而不可忽視的是《長恨歌》的弄堂生活，一如〈尋找上海〉中的老街臉相，在在凸顯了眼前的新城與老上海的關係有如柏拉圖二元宇宙觀中理念界與現象界的差異，對作者而言，如今新上海的繁華樣貌充其量不過是永恆不變的老上海失真的複製(copy)，不可恃的倒影(reflection)。

如果官商說法一逕強調老上海可借今日再造的全球城市還魂重現，王安憶小說中懷舊的複雜面向可供我們觀察上海懷舊熱與全球城市自我型塑邏輯之間的矛盾。對王安憶而言，老上海即是真正的上海。老上海可抗衡外在世界的變動不羈，是全球化新上海的本源。如此看來，懷舊自有其必要性。然而，王安憶的懷舊論述另一個明顯的意圖是強調懷舊的「正確性」，換句話說，如果不能明辨老上海精髓所在，懷舊終究只是脫離現實的耽溺。老上海日常生活的細節於是成了王安憶質疑當代上海一片懷舊熱的關鍵。王安憶透過小說人物與情節發展所批評的懷舊典型主要是1980年代上海都

<sup>27</sup> 港滬雙城記的論述分析可參見李歐梵《上海摩登》第十章〈雙城記〉、阿巴斯以及拙作：“Mutual Gazing and Self-Writing: Revisiting the Tale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s Global City-Regions”，「血脈相連」(linked at birth)一語出自阿巴斯(2000: 773)。



市轉型之際，一群對新上海充滿失落並力挺「古風」，緬懷舊時光的新一代都會人。雖然他們的關懷與官商重現老上海的出發點或有不同，但對王安憶來說，這些人的懷舊也大有問題。她認為他們最大的盲點在於只知迷戀老上海十里洋場的表面浮華，誤以為歌舞昇平，如戲如夢就是老上海精神，殊不知真正的上海本質(essence)是在家常瑣事，里弄人情之間。換句話說，王安憶一面透過虛構上海小姐的故事來建構自己的懷舊論述，同時又暗指1980年代許多懷舊都會人實是走岔了路。要讓自己的懷舊故事呈現真正在地的上海根源，而同時指出他人盲目懷舊的問題，作者先在書中創造了一個代表老上海的鏡相，那便是主人翁「弄堂女兒」王琦瑤。她一生起落的故事戲劇化地呈現上海大致從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變化：隨著王琦瑤從一個弄堂姑娘出落成上海小姐，<sup>28</sup>繼而成為交際花公寓中的情婦，之後再回弄堂成為獨立撫養女兒的單親媽媽，上海也跟著時代的腳步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sup>29</sup>王安憶心心念念要證明的是女主角王琦瑤就是上海的真實面，也是里弄日常生活的代名詞。

首先，王安憶對於上海脫離王琦瑤代表的里弄生活，一日千里飛快發展感到不耐，小說人物「長腳」即象徵全球化這個看似繁華的夢因為虛浮無根而具有危險性。換句話說，他是王安憶用來批判不知懷舊，一味追求上海現代化與全球化發展的人物。小說最後長腳惱羞成怒臨時起意殺害王琦瑤的情節，可謂寓言了新舊上海之間的衝突。再者，書中長腳的負面形象就某種程度而言可視為王安憶對全球城市二元化貧富差距意象的抗拒與壓抑。長腳是張永紅（王琦瑤女兒的朋友）男友，是個外鄉來的小人物，冒充自己是得志的上海「成功人士」。<sup>30</sup>這類典型的成功人士常是跨國企業

<sup>28</sup> 王琦瑤還是學生時因緣際會認識了業餘攝影師程先生，成為《上海生活》雜誌的封面女郎，之後參加選美成為上海小姐。這場眾所矚目的選美比賽算是弄堂女兒一生的轉捩點。王琦瑤得到第三名，俗稱「三小姐」。她的美艷雖不足以在荷馬史詩中傾國傾城，尋常的風情卻稱職體現了里弄的日常景致：「這三小姐也是少不了的……可說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數的，這大多數雖是默默無聞，卻是這風流城市的豔情的最基本元素。馬路上走著的都是三小姐……三小姐則是日常的圖景，是我們眼熟心熟的畫面，她們的旗袍料看上去都是暖心的。三小姐其實最體現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們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卻與我們的日常起居有關」（2000: 80）。上海令人流連的美景固然像大小姐二小姐，是誘人的淑媛，王安憶卻更意欲展現王琦瑤／上海真正樞樞動人的「核心」或是「精髓」——要是沒了世俗里弄生活作為基礎，美貌／城市的誘惑充其量是構不著的空中樓閣，是飽得了眼福滿足不了心靈的浮華世界。

<sup>29</sup> 以《長恨歌》為例來談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並非認為小說中的新上海即等同今日的全球城市。其實，上海時至今日仍未完全發展為如紐約或倫敦這樣的全球城市。但重要的是，上海自1980年代後期迄今的發展方向一直是以全球城市為典範，這樣的建構過程較之結果更能讓我們瞭解全球城市空間生產與自我形象塑造的意識型態與運作邏輯。在此感謝汪宏倫博士的提問。

<sup>30</sup> 敘事者描述：「是這些人，組成了他愛的這一個上海。上海的美麗的街道上，就是他們在當家作主。他和他的家人，卻都是難以企目的外鄉人。現在，他終於憑了自己的努力，擠身進去了。他走在這馬路上，真是有家的感覺，街上的行人，都是他的家人，心裡想的都是他的所想」（2000: 361）。



菁英，他們一身名牌，開進口轎車，出入高級餐廳酒吧與豪華辦公大樓，他們是空中飛人，常到世界各地旅行或開會，住的更是人見人羨的洋房豪宅。<sup>31</sup>值得注意的是，長腳之所以看不出上海真正璀璨所在，部分歸因於他外鄉人的出身，爲了與上海融合，長腳無所不用其極，到頭來仍不過只是個冒牌的「成功人士」。王安憶似乎藉此暗示，看似最全球化的人物往往是最鄉巴佬的(provincial)。

書中對長腳全球城市上海夢的種種細節描述旨在揭露追求上海璀璨表象的謬誤。沉迷於上海全球城市形象到了無法自拔的程度，長腳認爲自己等同於這個耀眼奪目的新上海。舉例來說，他憑空捏造的家世正是老上海不朽的神話：上海永遠是個讓人白手起家成爲百萬富翁的新天地。新上海這個準備在全球化年代大展拳腳的城市讓長腳天方夜譚般的家族史似乎不那麼荒誕。長腳不遺餘力地讓所有人信以爲真，以爲他的家族產業真的遍及全世界。他告訴張永紅自己的祖父是老上海著名的醬油大王，他是唯一的孫子，還是法定繼承人。根據他的說法，「祖父的醬油廠遍佈東南亞地區，歐洲美國也有一部分。他老人家的產業除去醬油工業，還有橡膠園，墾殖地，甚至原始森林，湄公河邊有一個專用碼頭，紐約華爾街在發行他的股票」（王安憶，2000，356）。每當長腳要爲債務避風頭，便聲稱自己要去外地幾日，看看海外歸來的親戚。例如農曆新年後有好些天看不到長腳，上海便盛傳他是去了香港了。人們說長腳這一去不會回來了，他的表兄弟爲他辦了移民手續，也有說他是去正式接受遺產(Ibid: 386)。不過長腳仍然再度現身（號稱從香港歸來）約了張永紅去咖啡廳，鉅細靡遺地描述他的香港之行。敘事者是這麼說的：「香港呈現在了眼前，他看得多麼清楚啊……他的美妙前程也呈現在眼前，他甚至提到了結婚這一樁喜事。他說他們的婚禮應當到泰國的曼谷去舉行，或者到美國的舊金山去舉行」（Ibid: 389-90）。王安憶暗示長腳的全球化迷思在於將老上海不朽的都市傳奇和當代大肆炒作的地球村景象混而爲一。這種空中樓閣的想像與里弄居民腳踏實地又切膚貼心的生活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此我想進一步解釋作者描繪長腳的敘事意圖與全球城市意象塑造的關係。吉哈(René Girard)的理論顯示，尋找「代罪羔羊」(scapegoating)是人類模仿(mimesis)行爲中重要的環節，常用於消弭天災以及化解社會不安。若吉哈的理論屬實，長腳無庸置

<sup>31</sup> 對「成功人士」意象的文化意義分析可參見王曉明與李陀合編之《在新意識型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

疑是王安憶筆下的代罪羔羊，藉以呈現作者心中的上海形象。<sup>32</sup>在上海，長腳這類人掙錢的方式也許看似「國際化」：他們陪外國人打網球，教授摩托車，充當城裡的臨時導遊，做兌換外幣的買賣。但是長腳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這些人光鮮表面下不為人知的一面。人們在為長腳的香港之行加油添醋時，事實上他正冒著寒風乘著別人的卡車去洪澤湖販賣水產。儘管他經常流連上海時髦的餐廳和酒店大廳，晚上還是得回到自己上海貧民區的簡陋屋子過夜(Ibid: 357, 359, 385)。這個在淮海路上昂首闊步的「成功人士」原來什麼都不是。長腳認為要在他那個年代做真正的上海人就得有錢，往來各地與各國人士交流。他是多麼渴望大家把他當作真正的上海人，以至於和城市裡所有混夜生活的「成功人士」們一樣，生活就只剩下交際應酬。<sup>33</sup>

如果長腳的問題在於不知懷舊，那麼王琦瑤最後一個情人老克臘便是王安憶批評的膚淺懷舊的代表。<sup>34</sup>要瞭解老克臘懷舊的謬誤必須先談王琦瑤在小說中的功能。王安憶藉由王琦瑤呈現日益消逝的老上海，讀者和書中人物亦透過王琦瑤這面鏡子看見老上海迷人的影像。這把日常生活的魔杖將上海轉了型，從一則令人覺得遙不可及的都會傳奇變作一本私房日誌，屬於所有願意將上海稱作「我的城市我的家」的人。對讀者與書中人物來說王琦瑤正是那面鏡子，可以將所有事物映射成值得記憶的片

<sup>32</sup> 有趣的是，如吉哈所言，代罪羔羊的刻板印象之一是受害者而非加害人(“The victim is a scapegoat”)，而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之一則是女性(Girard, 1986: 39, 49)。由此推論，被長腳殺害的王琦瑤似乎才是代罪羔羊。在此我想強調的是王琦瑤可說是小說情節(表層敘述)的代罪羔羊，然而長腳「鄉巴佬冒充成功人士」，最後又淪為殺人兇手的角色型暗示，他實為作者意欲透過敘事化解變動的全球城市帶來的不安與焦慮(敘事潛意識)的代罪羔羊。

<sup>33</sup> 全球城市的專業階級(the service class)和外省民工兩個社會階級在上海日益擴張，而這兩種階層的形象匯集於長腳一人身上。長腳是故事裡的頭號反派人物，所追求的新上海浮華與王安憶全力維護的老上海日常生活南轅北轍。長腳既是個假冒成功人士的鄉巴佬，這樣的冒牌身份模糊了專業階級與外省民工之間的權力衝突，進而使得上海轉型為全球城市過程中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隱而不見。為了填充全球城市的抽象空間，王安憶亟欲闡述上海的本質，將里弄日常生活描繪入微到不受時間影響而自成一格。這部分說明了為何大家看不見專業階級要求里弄居民讓出生活空間以利上海成為全球資本匯流中心，也看不見付出勞力打造新上海的大批外省民工並沒有太多使用新都市空間的餘地。簡言之，無論是專業階級或是外省民工，他們真實的生活空間都被隱匿了。然而在當代上海，理解王安憶/王琦瑤對老上海芳魂已逝而長恨不已的關鍵其實是當下兩組城市使用者與里弄居民對於生活空間不斷協商的過程。長腳的雙面人生活很諷刺地成為作者對敘事結構的合理交代。王安憶將長腳塑造造成一個「盲人」，看不見所謂上海的「精髓」，也就是王琦瑤所代表的老上海生活點滴。小說裡長腳大白天遊手好閒，就好像「一個蟲子在墓穴間穿行」，又好像「在這輝煌的邊邊上，最沉暗的一點上，因此他怎麼看也看不見自己」(2000: 358, 389)。長腳殺害王琦瑤不僅暗示他是看不見上海真貌的盲人，他代罪羔羊的身份更暫時轉移了讀者的注意力，使得全球化發展造成都市變遷的新階級問題被置換成一樁社會奇情案件，成了另一則上海傳奇。

<sup>34</sup> 老克臘是王安憶眾生相裡形象鮮明的人物，有著一張走在當代上海街頭常能撞見的面孔。他是個「都市閒遊者」(flâneur)，常在大馬路上溜達，吸吮老上海的氣息：「……真了解老克臘的是上海西區的馬路。他在那裡常來常往……茂名路是由鬧至靜，鬧和靜都是有年頭的。他就愛在那裡走動，時光倒流的感覺……上海東區的馬路也了解老克臘，條條馬路通江岸……江鷗飛翔，是沒有歲月的，和鴿子一樣，他要的就是這沒有歲月」(Ibid: 343)。老克臘藉由漫步幻想自己與老上海有所聯繫。

段，使他們得以與過往銜接。<sup>35</sup>王安憶運用鏡相這個最好的道具告訴讀者王琦瑤即是上海、上海即是王琦瑤。敘事者一再描述王琦瑤從鏡中人影和河中倒影看到了自己，也就看到了上海。別具意義的是，王琦瑤是那失落了的上海：她看到的不是自己的映像，而是記憶中的上海。例如，王琦瑤在情人李主任意外身亡後離開上海到了外婆定居的江南水鄉鄒橋，卻還是看見情感上永難割捨的上海。無論走到哪兒，上海的影子總縈繞她心頭：

……早晨，她對著鏡子梳頭，從鏡子裡看見了上海，不過，那上海已是有些憔悴，眼角有了細紋的。她走在河邊，也從河裡看見了上海的倒影，這上海是褪了色的。……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上海真是不可思議，它的輝煌教人一生難忘，什麼都過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牆虎，那輝煌的光卻在照耀。這照耀輻射廣大，穿透一切。（王安憶，2000：158）

儘管傷口沒有癒合，上海小姐仍須回到上海，因為鏡相無法與肉身分開。王琦瑤曾受弄堂的新朋友嚴師母慫恿，踏進理髮店燙頭髮。理髮店裡的情景一切都是那麼熟悉，王琦瑤再次看見鏡中的自己，但看見的當然不是現在的自己，而是過去的自己（Ibid: 168）。嚴師母又有一次把王琦瑤帶到家裡，在臥室的穿衣鏡前給她看一塊做大衣的絳紅衣料。王琦瑤這次從鏡中看到的是床頭櫃上的煙斗，心中又浮現過去在愛麗絲公寓當情婦的日子。這些例子證明王琦瑤終究無法與上海的鏡相分離，因為鏡相早已在時間的長河裡凝結，如影隨形。

王安憶詳細刻畫王琦瑤和老克臘這段感情，便在暗示眾人懷舊易於沉迷上海絢麗的表象而非里弄不受時間侵蝕的生活點滴。王琦瑤既是上海小姐更是弄堂女兒，老克臘卻只迷戀前者，不知芳華已逝的上海小姐之所以風韻猶存是因為弄堂文化打的底是紮紮實實，歲月不侵的，因此老克臘對王琦瑤代表的里弄生活的視而不見預示了兩人之間情愛關係的幻滅。書中老克臘這個綽號代表喜愛收藏老上海事物的癖好，<sup>36</sup>除

<sup>35</sup> 書中人物嚴家師母也當王琦瑤是「一同回顧老好日子的朋友」，因為兩人都見識過上海的絢爛風華，如今棲身較為平實的「平安里」。

<sup>36</sup> 王琦瑤的愛人，也就是女兒薇薇的父親康明遜，同樣為王琦瑤著迷，認為她的魅力總跟老上海風華脫不了關係。她像是1930年代紅星阮玲玉，是上海被共黨解放前充滿謎樣風采的代表性人物：「他好像看見王琦瑤身後有綽約的光與色，海市蜃樓一般」（王安憶，2000：203）。康明遜一想起王琦瑤照片中的倩影、舊刊物《上海生活》裡「滬上淑媛」以及「三小姐」的種種蜚短流長，便不由得激動起來：「這城市已是另一座了，路名都是新路名。那建築和燈光還在，卻只是個殼子，裡頭是換了心的。昔日，風吹過來，都是羅曼蒂克……他覺著他，人跟了年頭走，心卻留在了上個時代，成了個空心人。王琦瑤是上個時代的一件遺物，她把他的心帶回來了」（Ibid: 204）。其實真正令康明遜著迷的是王琦瑤作為一面鏡子投射出的浪漫老上海意象。

了1940年代老上海之外，大概難有其他事物能使這個充滿懷舊情懷的二十六歲中學老師醉心傾慕。老克臘代表的是一種典型，即是1980年代上海的懷舊青年，他們的共通點在於竭力抓住老上海最後一絲風華。這類人自然會被王琦瑤吸引，因為她正是古早風華的縮影，是他們所企盼親近的老上海：青春不再卻風華動人，時至今日仍無可取代。老克臘一開始便對王琦瑤著了迷，把她當作上海風華不老的象徵；他在一場聚會中見到王琦瑤，驚覺自己這才真觸及到「舊時光的核」。相較之下，以往只算得上是在「舊時光的皮肉裡穿行」(Ibid: 347)。王琦瑤的出現似乎終於讓老克臘拼湊出完整的1940年代影像：「他懷疑自己其實是四十年前的人，大約是死於非命，再轉世投胎，前緣未盡，便舊景難忘」。他又幻想自己是個在洋行工作的規矩男人，乘電車上班時意外身亡(Ibid: 348)。老克臘聽著王琦瑤娓娓道來上海過往風華，倏忽覺得她的臉如同水中倒影般虛無縹緲，因而垂淚感傷：「如今，哪裡去找這舊故事的頭啊！那故事的頭，雖然講的是悲劇，也是個錦繡繁華悲劇，這故事的尾將收在哪裡呢？」(Ibid: 373-4)王琦瑤對老克臘來說也許比任何老爵士樂來得真實，反映上海的老好日子，但老克臘真正渴望的是讓這位上了年紀的上海小姐老戲重演——王琦瑤是女主角，他則是忠實的戲迷。這段感情讓王琦瑤和她所代表的老上海顯得不僅抽象又像是在時光隧道裡停了格。<sup>37</sup>

小說以老克臘的故事暗示膚淺式的懷舊所造成的問題——老克臘對上海燦爛如夢的過往無法自拔，把這種戀物情結(fetish)轉移到王琦瑤身上，使她不像活生的人物反倒像戲中的角色，或者更像活化石。王琦瑤既是鏡相又是實體的矛盾說明了兩人情愛何以無疾而終。例如，老克臘有回和王琦瑤做愛時，王琦瑤像是「另一世界的人形」，極其虛幻，平常日子貼膚貼肉的感受蕩然無存(Ibid: 377)。王琦瑤一旦只是齣不變的戲碼，自然使老克臘的生活脫序。<sup>38</sup>後來，老克臘終於意識到王琦瑤這個活生生的老上海固然令他神魂顛倒，卻無法帶給他未來，更使他硬生生脫離了現實。在酒店泳池裡來回游著的時刻，老克臘似乎想通了這段感情未來的方向：「他在池子裡來回游著……水從身體上滑過的感覺也很好，告訴你身體的力量和彈性……身體內有一些

<sup>37</sup> 「他其實是有些把王琦瑤當好萊塢電影的女主角了，他倒並不充當男主角，當的是忠誠的觀眾。……看個沒夠的，雖只是個看，卻也常常忘了自己身處何地」(王安憶，2000：353)。

<sup>38</sup> 老克臘和王琦瑤發生了關係，大白天走在離開平安里的路上直覺得自己在作夢，此時片刻的歡愉伴隨而來的是攝人的夢魘。書中這麼敘述老克臘被惡夢所纏與原先的日常生活漸行漸遠：「……他卻不由自主地車頭一轉，駛上去王琦瑤家的路上，就好像那些夢魘在向他招手。他已經有多長時間沒有去唱片行？也沒有聽唱片，家裡的唱片已蒙上灰塵。……他只有去王琦瑤家，卻又製造了新的夢魘」(Ibid: 378)。

混濁的東西漸漸在運動中澄清了，思想也澄清了」(Ibid: 387)。老克臘離開池子，搭酒店電梯下樓，從電梯內看著窗外城市一片燈火輝煌，便想起宴會時王琦瑤靜默地坐在房內一隅。此時，敘事者道出老克臘的覺悟：「老克臘再是崇尚四十年前，心還是一顆現在的心」(Ibid: 387)。王琦瑤會用心向老克臘解釋當年的生活藝術才是老上海精粹所在：「那時候的上海，可是個小世界，東西南北中的風景都可看到，不過，話說回來，風景總歸是風景，是窗戶外面的東西，要緊的是窗戶裡頭的，這才是過日子的根本」(Ibid: 349)。諷刺的是，當老克臘開始釐清戲劇和真實人生的界線，回頭追求過日子的根本時，他與王琦瑤也就註定走上分手這條路。作者暗示這段戀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膚淺的華麗表象掩藏生活中細微末節的價值，老克臘愛的是老上海（小姐）的表面虛華鏡相，而非今時今日過家常日子的王琦瑤。

王安憶一面暗指不知懷舊與盲目懷舊的問題，同時又企圖透過自己的書寫呈現懷舊的「正道」。分析《長恨歌》的細節書寫，策略之一便是將城市生活細微處標誌化(monumentalize)，使這些生活的枝微末節絲毫不受外在世界變動的影響。以下的情景即是明證：在反右派鬥爭期間，書中主角王琦瑤、嚴師母、嚴師母的表弟康明遜、康明遜的中俄籍友人薩沙四人，每天總會聚在王琦瑤家中吃飯或喝下午茶。這時候屋內爐子溫暖地燒著，桌上油燈搖曳著藍色的火苗，大夥兒一邊吃王琦瑤準備的美味佳餚和各式點心，一邊打橋牌或麻將，談天說笑。王安憶詳細描述這群男女例行聚會中的飲食和娛樂，外在的政治動亂反倒輕描淡寫地帶過了。孰料有人可以在反右派鬥爭的紛紛擾擾中，過得如此悠閒愜意？作者是這麼描繪王琦瑤屋內的安逸如何與屋外喧擾的城市形成強烈的對比：

……這是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大事情，和這爐邊的小天地無關。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邊角上，或者縫隙裡，互相都被遺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飄著雪，屋裡有一爐火，是什麼樣的良宵美景啊！他們都很會動腦筋，在這爐子上做出許多文章。烤朝鮮魚乾，烤年糕片，坐一個開水鍋涮羊肉，下麵條。他們上午就來，來了就坐到爐子旁，邊閒談邊吃喝。午飯，點心，晚飯都是連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陽，有和沒有也一樣，沒有了時辰似的。那時間也是連成一氣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們才遲疑不決地起身回家。這時氣溫已在零下，地上結著冰，他們打著寒噤，腳下滑著，像一個半夢半醒的人。(Ibid: 193)

藉此王安憶呈現了一個瀟灑著及時行樂氣息的世界——那是上海隱密的一面，由市井小民生活中看似最雞毛蒜皮的事堆砌而成，但不可思議的是那樣的生活情境竟能不受干擾地保存下來。王安憶認為保存的力量其來有自，因為那些瑣碎事物到底是一切



的根本：「有許多吃食在爐上發出細碎的聲音和細碎的香味，將那世界的縫隙都填滿的。這世界的整塊磚和整塊石頭，全是叫這些細碎的填充物給砌牢的」(Ibid: 198-9)。或許可以這麼說，這些飛塵般零碎的事物是原子，是極其細微又不可分割磨滅的微粒。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微粒」加總起來，造就了王安憶心中不朽的上海。

相對於城市的標誌化發展，王安憶希望將上海生活細節標誌化，但如此的懷舊書寫終究要崩解，因為她的懷舊故事與老上海日常生活的相連根基只有主人翁王琦瑤，而垂垂老矣的女主角死期不遠，她所代表的老上海亦隨之煙消雲散。王安憶在上海成為準全球城市之際致力拉近消逝的在地空間與到處可見的全球化浩大工程，如此的努力固有其重要意義，但我們不能忽視其根本的限制，王安憶致力保存日常生活的枝微末節以穩固記憶中上海的形影，使全球城市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海市蜃樓。她不斷強調上海未來要有所發展就必須打好底子，而那底子便是上海過往生活的傳承。然而到底該保存多少日常生活點滴，才不至於使老上海脫離現實，跟不上全球城市發展的脚步？我們在《長恨歌》中找不到答案，上海的「真實面」無法如預期般給日益同質化的全球都市空間增添色彩，因為再怎麼重喚老上海靈韻也難以挽救全球時空壓縮下不斷流逝的生活空間。

本文透過分析都市計畫語言和文學文本說明上海懷舊語言是全球城市意識型態的特殊表現。上海懷舊因城市全球化而起，試圖將歷史發展的動線與想像中全球城市的原型編織成似乎天衣無縫的全球城市大話。王安憶的書寫也為此發展願景所驅動，但是文學的思考使她的作品凸顯全球城市大話—上海懷舊—的破綻，亦即歷史發展既然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日常生活依賴的地理空間如果消失，歷史也可能隨之凋零潰散。王安憶作品中一再呈現的將上海生活標誌化的企圖就某種意義而言或可視為全球化情境下的一種在地性的建構。<sup>39</sup>然而弔詭的是，召喚原汁原味的老上海並不足以充分消弭全球城市特殊地景與文化帶來的各種衝突。王安憶的懷舊論述仍須應付建構新上海空間意象的另一面鏡相，即是作為發展典範的全球城市。畢竟，自1980年代後期全球化腳步加速以來，上海逐漸曼哈頓化。對眾多上海人而言，可知可感的生活空間正遭受重大改變：大規模的都市重建計畫持續進行，王琦瑤所代表的蘊育細膩生活的居住空間不斷被壓縮，上海里弄以飛快的速度消失成了一棟棟高樓大廈。<sup>40</sup>細讀全球

<sup>39</sup> 感謝審查人提出的精闢見解。

<sup>40</sup> 小說最後數度提及那些里弄就像一艘沉船：「哦，這城市，簡直像艘沉船，電線桿子是那沉船的桅。……沉



城市的懷舊論述，我們發現或許新與舊在上海不能並存，上海的過去與未來像是兩面鏡相，相互映照，卻無法彼此連結，構成一體，而眼前所見的歷史深度感或許只是相互映照堆疊的幻影。<sup>41</sup>

船上方的浮雲是托住幻覺，海市蜃樓。耳邊是一聲一聲傳來的打樁聲……那打樁聲好像也是將這城市砸到地底下去的」（王安憶：353）。接近小說尾聲作者寫道：鴿子咕咕嚶嚶叫着，「是在向這老城市致哀。在新樓林立之間，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殘骸」（Ibid: 397-8）。若是將這段文字映照 Roger Chan 對浦西都市更新的相關報導，描述有些里弄居民不知自己的住所將被拆除，而他們也即將被迫遷往他處，那麼我們很容易明瞭「平安里」所面臨的新危機即是全球化造成的弄堂拆遷(Chan, 1996: 299-320)。

<sup>41</sup> 在此作者並非抽空(abstract)具體的時空(the lived space of everyday life)，認為上海的當下歷史不過是相互映照堆疊的幻影，而是強調懷舊論述所呈現的歷史感（今日全球化的上海有其長遠的根源可尋）或許是全球城市為落實規劃空間所塑造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感謝審查人的提問。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王安憶，2000，《長恨歌》。台北：麥田出版社。
- ，2001，《妹頭》。台北：麥田出版社。
- 王曉明、李陀編，1999，《在新意識型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 and 文學分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1999），《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2002，《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姚錫棠等，2000，《勇攀峰巔—浦東開發開放十年發展研究成果集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孫海鳴、劉迺全，2000，〈世界知名城市與浦東的都市化〉，收錄於姚錫棠等著《勇攀峰巔—浦東開發開放十年發展研究成果集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頁133-50。
- 黃宗儀，〈都市空間的生產：全球化的上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3期（2004年3月），頁61-83。
- 廖炳惠，2003，《關鍵詞》。台北：麥田出版社。

### 二、英文書目

- Abbas, Ackbar, 2000, "Cosmopolitan De-scriptions: Shanghai and Hong Kong" *Public Culture* 12(3): 769-786.
- Chan, Roger C. K., 1996,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 in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pp. 299-320, edited by Y.M. Yeung and Y.W. Su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n, Qingbai and Shi Wei, 1994, "Reestablishing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Beijing Review* 15-21 August: 14-7.



- Dai, Gang, 1990, "Large-Scale Development Planned for Shanghai." *Beijing Review* 23-29 April: 41.
- Fei, Xiaotong, 1990, "Turning Shanghai Into a 'Mainland Hong Kong.'" *Beijing Review* 22-28 October: 25-7.
- Girard, René, Trans. Yvonne Freccero, 1986, *The Scapegoa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 Huang, Tsung-yi Michelle "Mutual Gazing and Self-Writing: Revisiting the Tale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s Global City-Regions."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1.1 (January 2005): 71-93.
- Kaye, Lincoln, 1995, "Shanghai Resurgent: City's champions see it as region's natural lead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1 May: 20-1.
- Lefebvre, Henri,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7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ass, Harald, 2000, "Faster, Taller, More: Shanghai is Young and in a Hurry." *New World* 2: 16-23.
- Machimura, Takashi, 1992, "The Urban Restructuring Process in Tokyo in the 1980s: Transforming Tokyo into a World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1): 114-28.
- Olds, Kris,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Urban Spaces: Pacific Rim Megaproject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7: 1713-43.
- , 1997, "Globalizing Shanghai: the 'Global Intelligence Corps' and the building of Pudong." *Cities* 14(2): 109-23.
- Sassen, Saskia, 1998,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Tang, Xiaobing, 1997, "Melancholy against the Grain: Approaching Postmodernity in Wang Anyi's Tales of Sorrow." *Boundary* 2 24(3):177-99.
- Wang, Ban, 2002, "Love at Last Sight: Nostalgia, Commodity, and Temporality in Wang Anyi's *Song of Unending Sorrow*." *Positions* 10(3): 659-94.
- Wu, Fulong, 2000, "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 *Urban Studies* 37(8): 1359-77.
- Yatsko, Pamela, 1996, "Field of Dreams: Can Shanghai re-emerge as a key financial centr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8 July: 69-70.

Yeh, Anthony G. O., 1996, "Pudong—the Remaking of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 in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p.p. 274-97, edited by Y.M. Yeung and Y.W. Su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eung, Y. M. and Y. W. Sung eds., 1996,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ang, Xudong, 2000, "Shanghai Nostalgia: Postrevolutionary Allegories in Wang Anyi's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1990s." *Positions* 8(2): 349-87.



# Self-Fashioning of a Global City: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 Nostalgia

by Tsung-yi Michelle Hu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ain how the nostalgic narratives of Old Shanghai are informed by the projected self-image of the global city. I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ity in East Asia, two common rules underpin the rhetoric of place-making. First, the urban planning discourse projects an ideal other as a role-model, such as London or New York, for the blueprint of redevelopment. Second, this language tends to look back to uncover a historical era of the city and in so doing rationalizes the global city formation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old glories. In the process of Shanghai's urban restructuring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 promotion language finds itself exemplary of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mentioned above. The urban discourse of Shanghai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raws attention to Old Shanghai in the 1930s--the city's pas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serves to justify Shanghai's global city campaign. Meanwhile, the cosmopolitan culture and cityscape of Old Shanghai in this semi-colonial past are invoked as a predecessor of existing world-famous global cities. This Shanghai nostalgia, wish-fulfillment rhetoric indeed, takes a complicated shape in some of the works of Shanghai novelist Wang Anyi. Juxtaposing the urban discourse of Shanghai nostalgia and Wang Anyi's detailed portrayal of the good old days of Shanghai *lilongs* in her novel, *The Song of Unending Sorrow*, I tease out the tension between Shanghai nostalgia in Wang'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 and the two rules of self-fashioning a global city so as to further critique the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place-making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global cities.

Keywords: global city, Shanghai,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Wang Anyi